



程恩富主编：《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纵览

胡乐明 张建伟 朱富强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程恩富主编《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纵览

胡乐明 张建伟 朱富强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胡乐明等著. —北京: 当代中国
出版社, 2002.1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

ISBN 7 - 80170 - 049 - X

I . 真 ... II . 胡 ... III . ①新制度经济学 - 研究
②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 ①F091.349②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411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44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1.00 元

总序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共同合作，《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丛书终于问世了。它含有 8 本专著，涉及到俄罗斯东欧经济学、激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有的著作是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或罕见的。

丛书的研究特色，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借鉴和批判国外经济学说；二是中外融和，注重国外各种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影响性分析；三是文献资料丰富新颖，取材十分广泛；四是文风鲜活，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当今世界，人类经济思想基本呈现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另一类是反映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思潮。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激进经济学，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尽管同各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有重要区别，但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各种凯恩斯主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尽管名目繁多，但总体上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按照萨缪尔森的划分，激进经济学是学术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学术右

派，而凯恩斯主义是学术中派）。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苏联经济学范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中国经济学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代表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两大经济思潮既有相通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层面与共性的分析，也有本质相异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利他与利己、公有制与私有制、劳动创造价值与要素创造价值等本质层面与特性的分析。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中国要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理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同时科学地借鉴和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我们既要继续消除改革前盛行的某些“左”的学术倾向，也要及时消除改革后盛行的某些右的学术倾向。只有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的共产主义大同才会较快到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

最后，对本书编委会和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程恩富

2001年12月6日

(程恩富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上海市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著名理论经济学家)

《国外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

丛书编委会

主任：程恩富 李松晨 唐合俭

副主任：何玉长 张 永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艳 方晓利 冯金华 李 新

李松晨 朱保华 伍山林 张 永

何玉长 胡乐明 顾钰民 唐合俭

彭文兵 程恩富 漆光瑛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主流”的迷失	(1)
第二节 “异端”的见解：重视制度	(6)
第三节 制度分析的新框架	(12)
第四节 本书结构	(17)
第一章 “道德之神”	
——产权	(20)
第一节 “产权”是一种行为规则	(20)
第二节 产权是一束权利	(27)
第三节 “产权”来自何处	(32)
第二章 透视世界的“魔镜”	
——交易费用	(41)
第一节 由“交易”认识世界	(42)
第二节 经济社会的“摩擦力”：交易费用	(49)
第三节 交易的“架构”：契约	(61)
第三章 谁妨碍人们致富	
——产权安排	(70)
第一节 “世界永远有效率”？	(70)

第二节 私有产权不是“独步单方” (75)

第三节 走上富裕的临门一脚：产权界定 (81)

第四节 不利的产权安排为何存在 (94)

第四章 市场汪洋里的岛屿

——企业 (101)

第一节 “黑箱”理论 (101)

第二节 科斯的发现 (104)

第三节 团队生产理论 (111)

第四节 “契约之网” (114)

第五节 非营利组织 (119)

第五章 “生产的制度结构”

——企业的治理 (122)

第一节 从“自然人”到“法人” (122)

第二节 委托—代理问题 (127)

第三节 监督与激励 (130)

第四节 资本结构之谜 (136)

第五节 “超越产权” (142)

第六章 盛衰兴亡之源

——国家 (149)

第一节 走出“霍布斯丛林”：国家的起源 (150)

第二节 契约+暴力：诺斯的国家模型 (158)

第三节 天使抑或魔鬼：“诺斯悖论” (160)

第四节 “三位一体”：产权、国家、意识形态 (164)

第五节 国家的失败：两个案例 (169)

第六节 全球化博弈：国际社会的制度分析 (171)

第七章 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

——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	(180)
第一节 不同视角下的法律的光谱	(180)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一个总结	(193)
第三节 经济学如何打磨法律武器：主流效率法律观	(195)
第八章 制度的时间维度	
——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204)
第一节 “创世纪”：制度起源	(204)
第二节 制度的动态追寻：制度变迁模型	(206)
第三节 谁引导了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216)
第四节 “硬制度”与“软制度”：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221)
第五节 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226)
第六节 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	(232)
第九章 “重新发现历史”	
——新经济史观	(240)
第一节 重读历史：新经济史学的兴起	(240)
第二节 西方社会的兴衰	(243)
第三节 “李约瑟之谜”	(246)
第四节 奴隶制：残酷的效率？	(252)
第五节 庄园制的争议	(256)
第六节 为“圈地运动”翻案	(259)
第七节 铁路的贡献有多大？	(261)
第八节 限制垄断不如“消灭白蚁”？	(262)
第九节 新中国初期合作社为何解体？	(265)

第十章 现实主义的回归

——探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270)
第一节 冲破形式主义的迷雾：当代西方经济学的 现实主义运动	(270)
第二节 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当代制度主义	(283)
第三节 问题导向——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299)
主要参考文献	(313)
后记	(331)

导　　言

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费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下一代经济学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理论的应用，解释现实世界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变万化。然而，不幸的是，自那时以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既不能对现实世界众多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未能开出可以较好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药方。但幸运的是，60年代后，“寻求解释”的浪潮不断上涨，新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使经济学重新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为处境尴尬的西方经济学恢复了“荣光”。

第一节 “主流”的迷失

在《国富论》发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中，由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经过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补充、舍弃与改造，逐步形成了一套精致而规范的理论结构，并在当代西方主流

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臻于“化境”。以马歇尔为代表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利用数学和逻辑工具，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
形式化和精确化的改造，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颇具科学外观
的学科。

应该承认，在模仿科学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做得相当成
功^①。它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和分析工具，在一
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下构筑起看似严谨的理论框架。其精品范例是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那个理想世界中，市场是完全的，交
易费用为零，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将资源配置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
态。经阿罗和德布鲁在《竞争经济的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
中给出的关于一般均衡的存在的“确定的”数学证明，该模型中
的一切都是那么精密而漂亮，其科学性似乎容不得丝毫的怀疑。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科学的成功，它在分析能力和实证研究等
方面似乎都优于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体系和其他社会科学，从而
在社会科学中确立了相对的优势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常把非
主流的研究方法或思想流派斥为异端并作为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东
西而予以蔑视。显然，这种反多元主义或学术法西斯主义，是与
一门自认为伟大的“自由的”学派的学科不相称的。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取得了智慧上的巨大成就，并照亮了经济
体系的诸多方面，但无论如何，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成
功。事实上，那个广为流传的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世界，与人们
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并不存在太多的真实联系。在很大程度上，
它只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产生的乌托邦世界，具有突
出的非现实特征。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是用眼睛的观察加上大
脑的思考，再加上某些天才的猜测，努力向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
类经济活动的某种理解或知识，那么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做的

则只是尽力显示他们的智慧成就，努力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技艺”而不全然是“科学”，并由那些长于利用这种技能和能够按照那些常常是荒谬的形式和风格为杂志撰稿的人获得“博弈”的奖项^②。美国学者艾克纳（1990年）指出，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当代主流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多么苍白而远离实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最大化行为以及完全市场，等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些远离现实的假设之上的。我们毋庸赘述历来众多经济学家对这些假设的“不现实性”所进行的严厉批驳。诚然，任何的经济理论研究都不能没有假设，但假设绝不是可以随意设定的。假设必须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这是奈特、西蒙等人不断告诫人们的。然而，弗里德曼等人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并提出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所谓“假设不相关”论题。弗里德曼（1991年）认为，经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与经济分析的适用性无关，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且一般地说，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因此，“我们可以把两个假设为独立的检验（即对假设现实性的检验和对假设派生含义的检验）归结为一个检验”。这样，判断理论优劣和适用性只依赖于理论推理与经验检验的相符程度。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计量经济分析因此成为经济

理论争论的中心。对一种经济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不是争论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就是对所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提出异议。计量分析技术似乎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了“可检验”的理论而大大增强了它的“科学性”，经济分析却由此变成了“数学游戏”。

经济分析的数学化固然可以带来定义精确、较少歧义的好处，但如果将数学分析当做经济分析的惟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则会导致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及其创新能力的窒息。新古典主义的数学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数学登堂入室，喧宾夺主，成了经济学的主人，经济学家则成了数学的“奴仆”。那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品——一般均衡模型，尽管数学证明“精巧漂亮”，却是一个基于乌托邦的理论状态。实际上，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依赖于特定的限制条件，具体地说，只有具备了完全市场、对称信息和完全理性经济人的条件，才有一般均衡的存在。而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攀登这些所谓的智慧高峰，无非是因为攀登高峰能使人感到刺激和振奋（西蒙，1991年）。结果，沉迷于“数学游戏”的智力竞逐的经济学家们已无暇关注现实的世界。这种过分数学化的倾向，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譬如，对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制度的剖析，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的道路上走过了头，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人的关怀与分析。

在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都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和现实世界的分析。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则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传统，他们从远离现实的假设出发，以数学形式主义的分析工具着力分析他们心目

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使经济理论成了“象牙塔”中的“黑板经济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事实/理论的比率是极低的”，它几乎无需现实经济体系的详细知识，且致力于排斥这种知识的理论进展。企业和市场都是有名无实的，理性的个人不过是一台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科斯，1994年）并按确定程序运转的机器。尽管他们狭窄的视野聚焦于价格的决定，市场交易却被简单地视为无阻碍、无摩擦瞬时完成的过程；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企业和家庭则仅仅是一部部计算机器，它们的功能就是将最大化方案投入矩阵中去；“生产的制度结构”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和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工具。所以，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也分析了分工、交易及合作等人类经济活动，但其分析却是片面的、形式化的，即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因此，主流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失败是丝毫不奇怪的。20世纪中，主流经济学家们扮演了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的向导的角色，他们或者担任政府要职，或者作为政府顾问频频向政府献计献策。但是，事实上主流经济理论既不能对众多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未能开出可以明确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药方。他们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及前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巨大动力。无论是在反垄断还是在反经济周期上，他们也只取得过有限而短暂的成功。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付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上，他们更是处于难有作为的尴尬境地。更为糟糕的是，在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那些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设计的改革方案（如萨克斯教授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导致比其他的改革方案（如中国方案）更好的结果，反而给实行方案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福利

的下降。然而，面对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深信他们已将经济学变得更像“科学”，因而他们宁肯相信自己精美的理论模型而不愿相信事实，更愿指责现实而不肯检讨自己的理论，这样就使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愈加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精神——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然秩序哲学。

艾克纳（1990年）曾指出，维护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地位，并继续把它的优势作为讨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经济学永远不能指望成为一门科学。因此经济学这门学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把新古典理论仍然作为基本理论的核心，要么相反，有一天它可能成为科学。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称霸经济学讲坛之时，对其“心怀不满”的一大批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就一直通过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和建立在这种观察上的严肃思考，分析那些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因素，寻找着对真实发生着的经济活动的正确理解，试图将迷失了方向的经济学引入正途。

第二节 “异端”的见解：重视制度

在经济分析中，重视被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的制度因素，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无论从理论的一般精神还是从批判的内容来看，任何时期的制度主义者都是一长串经济学家们的彻底或不彻底的继承者。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就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内容。斯密将大量经过充分整理的经验和习俗的资料、根据及例证，连同旁证博引的历史细节（如关于白银、谷物贸易及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关于制度（如教育制度）的详尽无遗的全面分析，牢固而灵活地合成一体，构筑起一个“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为